



未来,在阿富汗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国际社会要多合作,向弥合冲突的方向前进。



命,只是“脚”而已,有时候会疼一下,有时候连疼都不带的。美国所要追求的,仍是霸权。为了霸权,美国可以和异质文明合作,可以和恐怖分子做交易。在这方面,“文明”没有冲突……

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明弥合

尽管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9·11”之后,美国通过搞“大中东计划”,搞“颜色革命”,在阿盟22个成员,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27国寻找新的代理人,树立所谓“民主”样板,可在亨廷顿看来,后冷战时代并非文明冲突的时代。“在后冷战时期,民族、宗教、文明问题越来越重要,但并非文明的冲突那么简单。”亨廷顿生前曾如此表述。

以阿富汗问题来说,国际社会要做的,是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弥合。潘光称,在苏军撤出阿富汗前后,国际社会一开始没有认识到当时的阿塔会在占领喀布尔以后杀死很多人,进行伊斯兰神权统治。潘光认为,2001年,美军出兵阿富汗,有一定合理性。然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再消耗下去,美国人可能感觉没有意义了。

“塔利班后来分裂成阿塔和巴塔,直到现在中国和阿富汗塔利班是交往的,有的国家是把阿塔定为恐怖组织,但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潘光说,“未来,在阿富汗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国际社会要多合作,向弥合冲突的方向前进。”

在巴以问题上,范鸿达亦认为,联合国、埃及、阿联酋等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世界大国要尽快开展切实有效的调解工作。“不加限制的巴以军事冲突一定会导致更大区域的动荡甚至是战乱,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这会令巴以、中东和世界面临更多困难。”

至于所谓文明的冲突之论,潘光认为,他更倾向于亨廷顿后期所说的观点:“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2006年,潘光

曾经作为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成员,参与一份有关“文明冲突论”的负面影响的报告研讨、撰写。报告认为,“很有必要反对公式化的偏见和错误理念,因为它们加深了不同社会间的对立与不信任。”

“自那时以来,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又从各个角度批驳‘文明冲突论’,并进一步阐明,只有促进文明交流、包容、互鉴,才能清除‘文明冲突论’的流毒。”潘光表示。

“事实上,文化框框只会强化已经两极对立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会助长一种错误的观点,似乎不同文化处于某种不可避免的冲突轨道上,因此会把本可协商解决的争端变为看来无法克服的、基于身份的冲突,而且还会挑起大众的绵绵想象。”该份报告如此写道。

在潘光看来,极端主义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宗教极端主义。当不同民族、宗教的群体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矛盾之时,极端主义便极力煽风点火,使这样的矛盾演变为恶性的冲突,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其实质并非“文明冲突”。“中东乱局就是如此,既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教派矛盾,又有当前围绕能源、水资源、交通要冲等方面的权益之争,互相纠缠而错综复杂。”潘光分析称,“一些冲突热点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以致冲突双方中的弱势一方采取极端手段来打击强势一方,这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上升的重要原因。”再加之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对某些争端采取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强力干预。如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分属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纷争。西方强国强力干预利比亚、叙利亚,包括阿富汗,图谋实现政权更迭,结果使大中东地区不同民族、宗教、教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差距和不平等的扩大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民族群体之间,则为极端主义、偏见和冲突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未来,人类如何寻找到真正的命运共同目标,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际,正是充分寻找契机的时候。■